

中共聊城地方党史资料丛书

难忘的岁月

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难忘的岁月

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难 忘 的 岁 月

谢玉琳

编 选 杜来雨

郭明生

聊 城 市 福 利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9千字 9.3印张

1989年7月印制

山东省出版总社聊城分社

准印证〔1989〕第17号

前 言

这次由学潮——动乱——暴乱的政治风波，虽已经平息，但血的教训却给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值得思索的问题。这次风波的到来决非偶然。是由国际和国内具体条件所决定的，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总和的产物，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过，“气候”是一个方面，工作也是一个方面。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那么多青年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被卷入，为什么许多长者却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不动摇呢！这不能说与了解革命历史、接受传统教育无关。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和共产党员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为了记取教训，加强革命的优良传统教育，我们编辑了一本回忆录《难忘的岁月》，文如其题，这里选入的确实是一些难忘的日日夜夜，牢记这些，可以知道胜利来之不易；铭刻在心，遇有政治风浪就不会犹疑动摇、迷失方向。

事实告诉我们，人们需要了解历史，也渴望了解历史。《难忘的岁月》，就是革命历史画卷中的一幅，是光彩照人的一幅，是革命前辈用史实撰写的一部英雄史诗、革命史诗，是一部充满革命真情、感人奋进的教科书，是凝聚奋斗精神、民族精神的小文库。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革命前辈

们，不仅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扫除黑暗，驱逐日寇，摧毁蒋家王朝，给人们打下了物质江山；而且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支柱，不避艰险，不怕牺牲，无私无畏，为民族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给我们积聚了一笔取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仅告诉我们中国革命是怎样的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而且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华优秀儿女为什么走这条道路，和怎样以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精神走出了这条胜利的道路，更启示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要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现在，把这本书奉献给您，我们盼您珍惜并从中汲取营养，盼这种可贵的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代代相传。

编 选 者

1989年6月

目 录

前言	编者 (1)
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恢复关系的前后	
——怀念黎玉同志	赵健民 (1)
回忆我在延安党校整风和学习党的路线	徐运北 (78)
难忘的岁月	杨立功 贾鲁峰 王惠卿 (90)
忆临、馆、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坚持	许梦侠 (100)
战前的进步读书活动	丹 彤 (104)
血火交织的岁月	孙 洪 (107)
高唐县工委的建立与卫东斗争	韩宁夫 (129)
追忆运东对敌斗争	<u>庞 均</u> (134)
烽火硝烟故土情	齐 涛 (142)
关于阳谷县“忠孝团”的一些情况	李一丁 (149)
忆鲁西北青年抗日挺进大队	郑校先 (153)
第四专区统战工作回忆片断	吕仲华 (165)
博平人民的子弟兵	
——回忆八路军先纵第五大队	胡洋生 (182)
记“九·二七”突破日寇	
的“铁壁合围”	曾思玉 (189)
在淮海决战的日子里	李来柱 (199)
青年要永远跟着党走	陈 沂 (208)
随军南下到湘乡	康 政 (215)

廉洁勤政为人民·····	沈彬	(232)
敌营生涯·····	李雷峰	(238)
遇难脱险记·····	张立仁	(258)

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恢复关系的前后

——怀念黎玉同志

赵健民

黎玉同志去世，已一年多了。为了怀念这一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奔波一生的老同志，我把他来山东前后的一段工作和我本人在同他共甘苦中一段经历一一写出，以表达对他的怀念。

一、濮县徐庄会见黎玉同志

1935年的冬天，天气已经冷了。

我虽已穿着夹衣，但外面还是套上了棉袍。

一天（我记得是星期五），我在济南商埠客栈向省立第一乡村师范挂电话。接电话的是门房工友（姓徐），我向他说明我要找四级一班的张元修同学。工友马上到四级一班叫来张元修同学。

张元修同学来后，问：“你是那里？”我告诉他：“我是吴培强。”元修同学随后说：“‘培强’哥吗？我很盼望你来这个电话！‘老掌柜’的已经来信了，他很想见你，洽谈一笔‘生意’。”我听后很高兴，告诉他：“很好，后天下午（星期天），到我‘西屋’里来面谈吧！”（吴培强，是

我当时的化名；老掌柜，是指我们要找的河北省直南特委党的上级关系；西屋，指济南乡师老校址的西边；生意，指党的领导关系问题。）

星期天下午2时多，我到济南北门外百鹤庄老校址以西东元盛染织厂以东的地方，见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张元修、支委委员刘少饒、景晓村和党员郭崇豪几位同志，已在那里等候。他们见到我都很高兴。

接着，郭崇豪同志说明他接到濮县王士希同志的来信，说直南特委的负责人已到濮县来了，要我去他那里会面。我听后非常高兴，并说：“我安排一下，后天就去濮县。”他们几位同志见我这样快的下决心去接上级党的关系，都很高兴。

为什么我们这样高兴呢，当时党内情况是怎样的呢？事情是这样的：

1933年2月29日，由于团省委书记陈衡舟被捕后叛变，使省委书记任作民、组组部长向明、团省特委书记孙善帅及省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学员等29人被捕，济南及外地的党、团组织有的也遭到破坏。省委机关被破坏后，由党的省委秘书长张北华同志组成了临时省委，张任书记，宋鸣时任组织部长，曹仲三（曹金言）任宣传部长，唐玉清（田海山）任组织干事。

同年4月间，北方局派刘泽如、宋澄来山东。刘负责党的工作，宋任山东省团委书记。不久，中央上海执行局亦派蔡泽民（又名张志远）来山东，负责党的领导工作。

7月2日，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省委又遭破坏，书记张北华、组织干事唐玉清、团省委书记宋澄及蔡泽民、刘泽如均被捕。青岛、泰安、沂水、寿光、益

都、潍县等地党的组织均遭破坏。

从1928年到1933年7月，山东省委机关多次遭到破坏。这次，由于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的投敌叛变，党组织受的损失最大，有300余名党员和与党关系密切的群众被捕。由于这次破坏，山东党并和中央及北方局失掉了联系。

从1933年8月，中共济南乡师支部和兵工厂支部独立地坚持开展党的工作：由于山东临时省委被破坏，未被捕的济南市委书记宋天民回胶东找上级党的关系，济南乡师支部的赵健民、姚仲明、王文轩等同志独立地坚持斗争，发展了济南乡师党组织，并向校外扩展。到1935年冬，以济南乡师支部和兵工厂支部为基础，发展了济南市的高中、一师、正义、育英、惠商职业学校、华北中学等10几个支部100多名党、团员。1934年5月，在济南市北五柳闸组建了济南市委，赵健民任市委书记，兵工厂支部书记陈太平为组织部长，济南乡师支委王文轩为宣传部长。

1933年夏，姚仲明去东阿县姜楼高小代课，发展了10几名党团员，建立了东阿县第一个党支部。依靠这个支部为基础，到1935年，东阿县已发展到10个支部，100多名党、团员。并在农民保家组织（红枪会）中较好地开展了工作。

1933年寒假（1934年2月初），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山东省冠县。在寒假期间，我发展了本县在济南惠商职业学校读书的孙锡恩（现名孙洪）和在寿张省立第八乡村师范读书的沙延孝以及在本县师范讲习所读书的钱洪勋和冯干才等4个人为党员。

由于冯干才、沙延孝的积极工作，到1935年，他们在寿张乡师发展了30多个党团员，并组建了支部。由于沙

延孝、冯干才、钱洪勋、许梦侠（现为四川省顾委主任）在冠县的工作，到1935年发展了30多个党团员，并组建了中心支部。冯干才发展了在临清第十一中学读书的王志浩为党员。到1935年，王志浩同志在十一中学发展了七八个党员，并组建了支部。聊城第三师范早有党的组织，约有党员20多人，1933年，山东党遭到破坏后，也曾派王晋亭去济南找徐运北同志寻找党的关系，我经徐运北同志介绍，1934年去聊城恢复了他们的关系。

当时，聊城师范党员申云浦同志已被学校开除，在阳谷私立崇实小学教书，掩护进行党的工作，阳谷一带约有党员30余名。

徐运北同志在他的家乡——堂邑县发展鲍廷干、于绍畲等为党员，到1935年，已发展了20多个党团员，并组建了支部。

由于鲁西党的恢复和发展，于1935年2月（农历正月初4），在堂邑县徐运北家组建了中共鲁西特委，徐运北为特委书记，钱洪勋任组织部长，申云浦任宣传部长，负责鲁西党的领导工作。

1933年8月，省委遭到破坏以后，中共莱芜地下党组织由于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特派刘莱夫（原名刘嘉典）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寻找党的关系。当他和济南乡师党取得联系后，莱芜县委书记刘仲莹同志于1934年10月间来济南，了解党的工作情况。我告诉他，济南乡师党自遭破坏后，也与上级党组织失掉了关系，现在是济南乡师党支部和兵工厂党支部独立地坚持工作，发展恢复济南市党的组织，并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的关系。刘仲莹同志赞同乡师党的作法，同意济南党与莱芜党密切联系，各自积极地寻找上级党组织关系。刘仲莹同志并告诉我：当时，莱芜党

有100多个党员，100个贫农团员，并与博山和新泰县党有组织联系。

1935年春，济南乡师党在全省范围内发动了一次反会考运动。由于被山东省教育厅发觉，用提前放假的办法，破坏了这次反会考运动。在联络反会考期间，济南党和鲁北平原县省立第五乡村师范地下党支部马诚斋、赵毅同志取得了联系。另外，乡师党的张元修在他的家乡——潍县，王文轩在他的家乡——寿光县，董麟仪在他家乡——东平县，各发展了三五个至10几个人的党团组织，并组建了支部。

1935年冬初，我去莱芜县鹁鸪楼刘仲莹家，经商议，全省已有组织联系的党团员已达500多人，需要成立一个省的组织，领导各地的工作，并寻找上级党的组织关系。经研究：省的组织名称为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由刘仲莹任工委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鹿省三任宣传部长。黄仲华任农民部长。并积极寻找中央及北方局的组织关系。刘仲莹同志告诉我，由于我在济南并具体地领导济南和鲁西、鲁北、鲁东党的工作，在上级党的关系未找到，他不能到济南期间，由我代理工委书记。

为寻找上级党组织关系，我于1934年秋和1935年春，两次去泰山冯玉祥处，通过范明枢（范当时是帮助冯办武训小学的）、鲁宝琪和乡师化学教员刘乞夫，寻找党的关系，均未找到。

另外，由徐运北与乡师的同情党的先进教师田佩之到北平寻找上级党的关系，北平由于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对地下党的摧残，也没有找到党的上级关系。

还有刘仲莹同志，他曾两次去上海找中央关系均没找到：鹿省三同志也去上海1次，并找来1个人，当我与上海来的这

个人接触时，由于双方都有些小心谨慎，结果关系也未接上。

1935年暑假期间，上海中央执行局也派一位姓梁的同志以“上海抗日救国会”的名义来山东，我也以“济南学生抗日救国会”的名义与他见过面，但同样双方都有些谨慎，结果也没有谈成。

1934年，乡师招收六级新生。其中，有一位叫郭崇豪的同学，于1935年春在乡师被发展为党员后，他说他的家乡濮县有党组织。放暑假了，郭要回濮县老家，我让他了解濮县党有没有上级关系。并告诉他，济南党自1933年后，与上级党失掉联系，如果濮县与上级党有关系，我想和他们取得联系。郭1935年9月回到学校后，他说，濮县党有上级关系，是从河北濮阳那里发展过来的，他们欢迎我去和他们联系。我听到郭崇豪所说的濮县党的情况后，认为这是寻找上级党的领导关系的一个比较可靠的线索。

1935年秋，我拿着郭崇豪同志的介绍信，到了距济南500多华里的濮县古云集，见到了小学教员、共产党员王士希同志。在我到达的第二天，王士希同志找来直南特委代表刘耀先（刘晏春）同志。我向刘说明山东党从1933年7月被破坏后，党组织恢复与发展的情况，并多次到上海、北平、泰安找上级党组织没有找到的情况，希望能通过直南特委向北方局反映，并希望北方局派人来恢复山东党的关系。刘耀先同志讲：直南特委是受河北省委的领导，他可以把我的意见反映上去。待上级党同意后，就告诉我再来濮县取得联系。并规定暗语，在写信时，把上级党说是“老掌柜”的。

如上所说，山东党和上级党失掉联系已有近3年的时间了（1933年7月至1935年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恢复和发展了一部分组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多处寻

找上级党的组织关系。现在总算是有了比较可靠的眉目了。我高兴，张元修、刘少觉、景晓村几位同志都高兴，这是很自然的。

当晚，我回到我的住所，用暗语向刘仲莹、鹿省三写了报喜的信。于次日（星期一），我到济南市洛口龙湾庄5号，向陈太平同志说明了情况，安排工作后，就推着自行车到修车铺详细地检修了一下车子。

第二天一大早（星期二），我就骑着自行车向濮县进发。约半个小时，就赶到齐河县渡口。过了黄河以后，急顺黄河大堤向西南前进。在大堤上，小商小贩有推车的，有挑担的，也有骑自行车的，人来人往，穿梭似的行进。

黄河东面的平阴、东阿，山脉紧密相连绵延起伏，一眼望不到尽头；黄河的西面，是一望无际的鲁西大平原，在田野里，到处是一片葱绿的麦苗；泥沙混合的黄河水，滚滚地向东北流去。这一切青山、黄水、田野的迷人的景色，我都无心去欣赏、细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地到达目的地，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只见我的自行车箭一样地向西南飞奔。小商贩骑自行车的速度，一般是比较快的，可他们都一个一个地被我抛在后面。

中午12点时，我已进入陶城埠。陶城埠，人称“坝头”。这里，有几家客店，我在客店里，一顿就吃了1斤烤厚饼，1盘炒豆腐，喝了两碗开水。午饭后，未有休息，顺着金堤（又叫太行堤）继续向西前进。

下午5时多，就赶到距济南380华里的寿张县，在北关路西小店住下，休息了一会儿，吃了1碗面条。随后，我就到寿张东关省立第八乡村师范，找到支部书记王福昌同志，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并和我约定，晚上带几个支委同志

和我见面。

黄昏后，王福昌同志和沙延孝、冯干才等同志到北关小店和我见了面。我们当即到寿张县城西北金堤南侧下，在一片稠密的树林子里开了一个小会，他们汇报了情况，告诉我：该支部的党团员现已达30多人。党团员各班都建立了党团小组，人数少的班，联班建立党、团小组。他们关心的是“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签订后，中国和日本 的形势；关心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情况；关心找上级党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塘沽协定”，事实上是把冀东20几个县划为停战地区，承认日本占领东北4省的合法性；“何梅协定”，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个省的领土主权。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积极活动华北五省“自治”。看来，日本帝国主义是要一步一步地占领全中国，实现田中义一在奏折中提出变全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狼子野心。全中国人民已经看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对内积极“围剿”红军，妄图消灭抗日武装力量的反动本质。目前，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苏区，二、四方面军已到达了川西北藏族地区，国民党反动军队对红军已没有办法再实行“围剿”了。现在看，全国抗日救国的高潮不久就会出现，我们山东党应该作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告诉他们党支部要继续领导同学们多读马列的书，多看报纸，领导同学们多讨论形势时局的发展。要严密党的组织，不使一个没有政治觉悟的、品质恶劣的人混入党内。……

交谈到10点多钟，我见时间太晚了，要他们赶快回去，否则校门一关，就进不去了。他们讲，校门关了，可以翻墙进去。非常愿意多谈一会儿。11时后，我再次催他们回去，就这样，我们就分手了。他们走后，我也回到小店休

息了。”

第二天一早，我从寿张向濮县古云集前进。范县县城是在金堤的北面，紧靠金堤（太行堤）。我在那里没有停留，从南侧越城而过。范县以西，在金堤北边，有东西长20多华里的果树林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么大面积的果树林，除冠县北王羨，邓岗屯的果树林外，其它的地方我还从来未见过的。越过果树林，西行几十里，有一个大的村寨——道口。同行小商贩说：“过道口就要受盘查。”我问他：“是什么人盘查？”他说：“是红枪会的人。”“道口有400根杆子（红枪），100条钢枪，一个月前我过这里，堤南有被红枪刺死的3具尸体，说是当土匪的。”到了道沟附近，见村寨紧靠金堤北面，果然看见东门南有人手持红缨枪，进行盘查来往行人。我到道口南金堤上，有3个手持红缨枪的农民，走过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告诉他们，我是阳谷县的，是小学教书的，到濮县同学家去，他让我去他那里教书。农民说：“你是不是做共产党活动的？我们有指示，要搜查共产党。”我说：“我是教书的，不知道什么共产党。”他要我到他们佛堂里去谈。我随他们到佛堂后，只见佛堂在村中间，路北为3间瓦房，佛堂中供着一尊佛像，桌上摆着香。不一会儿，从佛堂侧边走出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叟，后边跟着四五个手持红缨枪的人。农民叫他师傅，我向老者又重复了一遍，说我是教书的，是到濮县去的，因为濮县同学要我去他那里教高小。老头把我上下打量了一遍，随后讲：“教书先生我们是尊敬的，过去教书的都是带胡的，你20多岁就当老师了，真是新世道。喝碗水再走吧。”我说：“不客气了，我还要赶路。”随即推着自行车西走，还听到老师傅与他的徒弟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一定

是满面杀气，竖眉立眼的，这个人面善口和，不会是共产党。”出西门，上金堤翻身上车向西而去。我心里想，自称刀枪不入的红枪会老师傅，这样认识共产党，这应是了解他们的一个经验，以后加以注意。在金堤上大约走了八九里，同行的小贩说：“前面是马陵道，是孙臆杀庞涓的地方。”我心里想，孙臆伏击庞涓，已2000余年了。当年，这里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而今，此处已是五里一村，十里一寨，成为“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的境地了。过马陵道时，感觉金堤成南北形。马陵道也就是一个一两百户人家的村子。在东边有一个似庙宇的中等祠堂，我骑自行车穿村而过。再往前行，金堤又转向西南方向。

下午大约3时，我就到达了目的地——濮县的古云集。到了王士希同志的家里，王士希同志不在家，他爱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告诉我：士希就在集西附近的徐庄。我喝了一碗开水，就向西走。到了徐庄，在村中间路北一个南北巷子东边的一个3间北屋小学校里，见到了王士希同志，他高兴地说，判断你最近几天会来到，今天果然来到了。3间房子的东面两间是教室，西间是王士希的卧室，屋里已升上了炉子。他告诉我，河北省委的代表来了，晚上可以和他见面。并讲，这个庄有个民团团团长徐团长经常来我这里，如他来查问，就说你是我的同学。晚上8点多钟，王士希带我到村西边的一个农民家里的南屋，见到了黎玉同志。我们两个热情地握了手。只见他有近30岁的年纪，中等偏高的身材，穿着一身黑布棉袍，两眼炯炯有神。说着普通的北方话，细听微音又象是山西口音。他让我坐下。黎玉同志讲道：北方局对于与山东党失掉联系，也很着急，多方面派人联系，现在终于联系上了，这就好了。接着，我较详细地讲了山东党自